

新 中 華 叢 書

文 苑 談 往

第 一 集

楊 世 驥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新中華書文苑談往（第一集）

◎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楊世驥

發行人 姚戟楮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潘序

文學者各有其努力側重的方面。從人生社會觀照上，涵泳胸襟，抒寫智慧，是文藝創作家。從文學欣賞上，發掘蘊蓄，解釋精微，是文學批評家。從文學潮流上，貫穿千古，看出文學的大勢，給往代以公平的評價，導將來以應有的歸趨，是文學史家。因為各有側重，所以創作家不必同時兼作批評家，文學史家不必同時作詩寫小說。因為同屬文學範圍，所以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寫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創作；而一個創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評的最精確標準。這如同一株大樹，雖其根幹花果形狀上有些差異，却同屬於生命的完整。

所以文學者的修養，要從各方面努力去體認完整，也要從完整中分向各方面去精研其所求的專一。而在這修養工夫上，尤其有一件根本至要的精神：那便是黝華崇實的精神。「修辭立其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作人的實訓，自然也是治學的南針。不具備這基本條件，不立足最高處開拓胸襟，不自己看重工作的本身價值，遠超過一切浮譽虛榮，不以一點一滴的辛勤來完成包舉宇內的雄心，其結果若非完全無成，便是一得自封。在今日中國學界風氣掃地以盡之時，轉移風氣培育根本，非有篤實君子以身作則斷難有所挽回的。

我的朋友楊世驥先生立志探研中國文學史。他在七年前本已寫成一部近代中國文人志，鄭振鐸先生爲他作序，有幾家書店熱切地向他接洽出版。但他子細校讀，終於決定不刊布。並且由此決定作更精深的用功，切實探究每一個人的成就，每一個微小的問題，期於在源頭上以細流匯爲大海。我在四年前尚讀到他那尺多厚的棄稿，想到書坊玻璃窗內裝璜美麗的書冊，覺得他正以樸實的儒生步伐靜默地沉着地踏在那些書冊之上。

如同一個潛夫在郎署，他白晝了公事，夜晚治文學。有些閑工夫，他便到各處去搜尋材料。以戰時後方文物的凋敝，他居然盡可能網羅了許多放紛史料。他去讀、去想、去證、漸漸地，漸漸地融匯貫通了許多新穎的見解。他這時實在已經得到學問本身的快樂。他的生活異常充沛。他的一件舊長袍，一堆堆破了封面的書，彷彿永遠發射無

盡的英光，照耀得世上最大最肥的富翁那樣地寒瘦。他的大書還不會出來。他還要等待。

然而他並沒有放下筆，却是辛勤地存寫。他的意思，第一步要寫一部「近代中國文學述論」，系統地，廣泛地建立中國文學史新的第一步規模。以戰時關係，許多材料還需要補充，許多問題還不能得到確切不移的論定，因此一時無法完成。其中素來爲人所不注意的一部份曾經應中華書局之約陸續在新中華雜誌及他處發表。這便是現在集印的一冊「文苑談往」。自然，在這小冊子中只是一鱗一爪，但可注意之處已經很多。

第一，近代文人的生平事蹟及著述，大多淹沒失傳。「同光」以來，國家內憂外患，紛乘迭起，愈促成這種趨勢。坊間所出文學史或則成書倉卒，或則根本未下網羅工夫，因此無一部精審詳盡的。一些前輩老成，熟於舊事，或者懶於傳述，或則不願爲此，或則他們的文學見解不盡弘通，縱有所傳，未爲興要。一些後進之士，又多虛浮輕躁，不多讀書，因此更無裁筆之人。世驥對這一點十分注意，他正在建立他廣博的基礎。我深切地知道他，往往一字之微，用去了悠久的歲月和曲折的訪尋。

第二，中國古代的史家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爲一己的正直責任。世驥在闡幽的一點上，十足表現正義。他研究近代中國文學概況，一貫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驅者們。這種態度是忠實的，也是義俠的。即使在這小冊中，我們讀了「樊鍾與蘇興」，纔知道當時有這樣兩位典型的人物；讀了「周桂笙」，纔知道這位翻譯界的啓蒙英雄；讀了「戲曲的更新」纔知道那時演進的大脈絡和那些陌生的人名。如此之例舉不勝舉。有了他，將重新把文學國度裏那許多久已埋沒的陳勝吳廣們復生起來。這意義異常深刻。

第三，小說有外國被看重也是不久以前的事。在中國素爲文學者所不屑道。以我自己說，雖然知道晚清許多新思潮，新運動都由通俗小說傳播，同時許多惡劣的社會現象，也祇有這些小說反映得最翔實，要想真切的看到那時代，應該看一些這類的書。但我却怕耐心識那些不甚精美的文字，並且也得不到那些久已散亡的冊子。錢杏邨先生在世驥之前首先對晚清小說感到興趣，已經著有專書。世驥在這一面更是用了工夫。就他現在手邊的材料，幾乎超過錢先生所見過的一倍有餘，其來源非出自蘇、滬一隅，而尤注重內地各省民間小說的發掘。他像一個工程師一樣

理，正在鑄鑄着千千萬萬的廢鐵，以期作出系統的報告書來。我相信許多讀者，將第一次從他得知那些冷僻的小說名字。

第四，世驥的筆調鋒利而圓轉，更能溶入動人的感情。他敘寄禪和尚那樣宛委，敘彭遜之那樣跌宕。他的夾敘夾議的靈動風格，使我們如聽最會說話的人「談故事」。雖然他的態以那末嚴肅而我們絕不是枯燥地在「讀史」。

這是他文字修養最成功的地方。於此，我們看見他不但有史家的專精，並且有文學者的完整。

新生中國的輪廓，雖然包含千頭萬緒，但其精神必然由這種廣大簡樸中漸凝漸顯。以新中國的文學史而論，也決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在短期間所能成。這完全有賴於篤實踐履的學人共懸一目標，分擔其辛苦，逐漸築堅拓大其基礎，纔能竟其全功。世驥的這本小書，可以說是他自己以及別個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塊石頭。我作這一篇序，更嚮望到壯闊的將來。爲了他們的著作，即使我至多不過是一個拙劣的鈔胥，我也將欣然願爲傳寫的。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重慶玄隱廬題記，潘伯鷹。

文苑談往 第一集 目次

潘序	一
樊鍾與蘇興	一
英美三教士	四
周桂笙	一〇
徐念慈	一五
吳之英	二一
詩界潮音集	二四
張登壽	三〇
黃讀山	三三
曾彥的「桐風集」	三八
寶廷	四一
劉毓盤	四二
戲曲的更新	四五
招隱居傳奇	六五
黃世仲	六七
彭俞及其「泡影錄」	六九
文明小史	七四
冰山雪海	七九
吳沃堯「歷史小說總序」	八四
痛史	八五
新石頭記	八六
	八七

劫餘灰	九一
瞎騙奇聞	九三
發財秘訣	九四
電術奇談	九八
良嶽烽	九九
驂游記	一〇〇
新壁鏡	一〇一
禽海石	一〇三
新癡婆子傳	一〇四
鄰女語	一〇五
女銅像	一〇五
還魂草	一〇七
上海之維新黨	一〇八
市聲	一〇九
掃迷帚	一一〇
康聖人顯聖記	一一一
未來教育史	一一三
斷腸草	一一四
後官場現形記	一一七
擣杵萃編	一一八
	一二五

文苑談往 第一集

樊錐與蘇輿

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年，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力行新政，其影響最大，受到當地文人反對最烈的是開辦時務學堂和創立南學會。因為新舊思想的不同，還加上意氣的作祟，致使湖南發生一場不平凡的鬥爭，這種鬥爭展延了三四年之久，直到戊戌之變，陳氏革職，南學會無形停頓，時務學堂也被改為求實書院，舊派得到完全的勝利，方纔漸漸地平息下去。

樊錐與蘇輿當時都是湖南人中的後進之彥，他們各以最激烈的姿態，出現於那次鬥爭之中，代表了新舊兩個極端相反的傾向。

值得同情的，當然是樊錐。錐字一鼎，邵陽人。光緒丁酉拔貢。少時攻讀長沙城南書院。與蘇輿同出王先謙門下。梁啟超、黃遵憲在長沙組織南學會，他首先在邵陽組織分會以為響應。自任會長，手訂章程。章程的措詞表面很和平，實際是要提倡「民權」和「平等」，一時入會的人甚衆，蘇輿「洞燭其奸」，便挺身出來和他作對，將他所擬的章程逐條反駁。如章程裏有「倫常乖舛違背孔教者雖有保人不准入會」之語，原是很平常的，蘇輿看見他利用「倫常」和「孔教」做盾牌，因此駁斥他道：「若然，則樊錐永宜屏絕不准入會！蓋平等邪說，自樊錐倡之也。無親疏，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尙何兄弟夫婦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則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豈但所謂『乖舛』云乎？聖人倫之至，似此滅絕倫常豈格外更有『違背』者乎？若而人者在會諸公宜如何處治，以挽倫紀，以扶聖教，豈直『屏絕』已哉？今諸公反推為會長，其於學會章程大相刺謬，閱者省覽焉！」大肆謾罵。可是舊派的攻擊和污蔑終於敵不過時代的要求，分會會員有增無已，並不因此減少。稍後巴陵，沅州等地南學分會也紛紛成立了，唐才常譚嗣同在瀏陽創辦的羣萌學會也改組為南學分會，新派的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起來。

他在這時，更著「開誠篇」「發錮篇」諸文，發表在「湘報」上，其持論的激烈，見地的透澈，實出當時譚嗣同、梁啟超諸人之上。尤其是「開誠篇」一文發人之所不敢發，信筆直抒，沒有絲毫顧忌，像奔迸的火花似的，使跟腦遲鈍的人讀了，直爲之目眩，無不認爲「悖謬」。蘇輿也就不惜以詳盡的毒辣的口吻加以駁斥。如開誠篇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復見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復以是受之，二千年淪肌浸髓，梏桎桎，酣嬉怡悅於苦海地獄之中，縱橫馳驟於醉生夢死之地，束之，縛之，踐之，踏之，若牛馬然，若苴苔然！」蘇輿駁道：「我朝開國以來，教養兼盡，上何嘗愚下，下何嘗受愚！且二千年自漢迄今，其間聖君賢相理學名儒，不可殫述！樊榭謂其梏桎夢桎，酣嬉怡悅，束縛踐踏，若牛馬苴苔，目中固無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內也。樊榭不產於空桑，安得出此喪心病狂之論！」接着又說：「今宜上至百僚，下至羣醜，俱如此類，網羅淨盡，聚之一室，函而閉之，使其不見日月，不與覆載。」蘇輿駁道：「自古權奸逆豎，心懷叵測，必將忠臣義士，一網打盡。樊榭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臣義士，無噍類矣！」以及「是故願吾皇縱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問於人，不謀於衆，下一紙詔書斷斷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極，雖有目前，一無所用，與其肢剖節解，寸寸與人，稅駕何所，蹶天無能，不如趁其未爛，公之天下，朕其已矣！』」蘇輿駁道：「天子詔命豈臣下所敢戲擬，況此等大逆無道之言乎？國典具在，變割寸磔處以極刑似尙未足蔽其辜。」他論到民主政治的必然起來，則說：「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爲是，窮極生變，變極生智。」蘇輿駁道：「治天下者，大權不可以旁落，況下移於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榭貴人人有自主之權，將人人各以其心爲心，是使我億萬人民散無統紀也；樊榭謂可以一其心，吾謂實億萬其心也。此則亡且益速又烏能起而救之！泰西國固多民主，然法國議院朋黨蜂起，卒爲國禍，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雖曰窮極生變，變極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聖以來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其斯以爲智歟？眞漢奸之尤哉！」還有：「洗舊習，從公道，則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士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蘇輿駁道：「尊卑貴賤，有一定之分，法律條例，有不易之經，樊榭公然敢以猥鄙惡劣謬亂字樣

詆毀我列聖典章制度，毫無顧忌，其狂悖實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紀年，直曰以耶蘇紀年可耳。」二人皆各趨極端，而樊錐在當日抱着改革政治和社會的熱忱，主張從根本破壞着手，無論其是否膚淺，他能夠站在時代的尖端，不顧環境的迫害，精神已不可及。他文章的組織以八股為根底，而能開闢自如肆應不窮，字句間橫溢着熾灼的情感，實開梁啟超戊戌以後政論之先河，尤為難能可貴。可惜今日已無從搜羅他更多的著作了。

他的勢錢，實在太高張了，終於被邵陽人士勾結官員，給他一個「亂民」的罪名驅逐出境，並四處張貼他的罪榜其內容是：「立驅漢亂民字人邵陽士紳軍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貢樊錐；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壞倫常，惑世誣民，直欲邑中人士盡變禽獸而後快。我邑公同會議，於四月十五日齊集學宮大成殿禱告至聖孔子先師，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刊刻逐條四出張貼通告通省，倘該亂民仍敢在外府州縣倡布邪說，煽惑人心，任是如何處治並無異論，特此告白。」云云。先知先覺之士，無疑要被人視作洪水猛獸，非予以撲滅不可。他雖然失敗了，而敵方的手段，徒然表現卑鄙與強橫而已。他離開了邵陽，離開了湖南，無地自容，便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肄業。一九〇〇（庚子）年歸國，因與蔡鐸有師弟之雅，鐸時在桂林創辦法政學堂，聘請他為總監，後與他復因事齟齬，他未及看見民國的成立，就鬱鬱而死了。

樊錐的勁敵蘇輿，字厚齋。平江人。王先謙認他是最能「紹傳已學」的高足。（見王氏「葵園校士錄」）梁啟超輩在湖南活躍的時候，先謙以嶽麓城南書院院長之尊，雖然看了很不順眼，似乎犯不着直接與他們為敵，所以始終保持緘默，而由他作了馬前卒。他在戊戌變後一月，將那次門爭中舊派諸人論說和朝臣保庇他們的奏摺，輯成「教義叢編」一書，保存了當日最翔實的史料。這部史料雖然記載了他們衛道的勝利，也塗上他們不可原恕的意氣的污點。他後來也曾到過日本，旋供職郵部。他所答辯和維護的政治制度既日就於崩潰之途，本人也就頗不得志，從此祇好專心述作。所著有「春秋繁露義證」若干卷，由先謙代為刊刻行世。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以詩為主。有「自怡室詩存」四卷，又「灑淚集」若干卷。其詩就技巧言，才情弘灝，偶為艱險，如履平路，蓋完全是學韓而深有所得者。「自怡室詩存」自言係取「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自寫牢鬱，聊為紀念。如讀昌黎記所云：

獨開窓與闌詞場，選道騷心李杜光，訓子乞恩休詆議，性情真處見文章。
 髯蘇儻耳激哀吟，屈子離憂澤畔吟，我讀潮陽南去什，一般淒絕逐臣心。
 強效鹽梅愁暮雪，夢論炎熱視春花，却將世事成悲咤，把卷真同一歎嗟！
 塗改盧仝謂皇甫，平生東野一低頭，劇憐薦士綢繆意，空盼三千起唱酬。
 平行蘄讎傲天神，留得人間爛強身，獨有小園桃李在，金釵略遣座添春。
 靈穎往還釋不癡，桑輿遙契莊爲師，終嫌佛語汙纖素，賈作誰囑阿鼻尸。
 由此可以看見他詩學的淵源，他始終是「留得人間爛強身」的，一九一二年，他即以「國變掛冠」還里，他的「潑淚集」爲何事而潑淚？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因爲深得先謙信任，先謙晚年無子，適將全部產業交給他經營，他便拿來變賣經商，不數月即虧累淨盡，致與王氏族人興訟，大約在一九一四年，憤恚而死。

英美三教士

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一般有志之士，覺悟到中國有改革的必要，於是著爲議論，恣肆地宣達對於時代的觀感，或建議朝廷，或指摘敝政，或紹介西洋政法制度；因爲新事新理日趨繁複，不得不打破歷來古文、駢文和八股的章句義法，自由起訖，信筆直抒，同時儘量容納新的名詞，引證新的史實，另創一種風格。這一類作品，胡適曾經名之爲「時務的文章」（見「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而最早試寫這種文章的人却是幾個外國在中國傳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桂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爲當時重要的代表——他們抱着宗教的虔誠，希望中國走上新的道路，所辦的報紙刊物，所做的文章，給予當時影響極大，隨後鄭觀應、康有爲、梁啟超、劉楨麟、黎祖健、管斯駿等繼踵而起，使這種文章的體式更完備了，勢力更擴大了。

三位教士來中國最早的要算李提摩太。他是英國人。爲倫敦使信公會教士。一八六八（同治戊辰）年就被派到

山西傳教，數年後適值河東一帶大旱，他目睹各地饑殍載道，一般逃亡的災民，轉徙流離，雖欲以草根爲食亦不可得，就以會中經費悉數購辦賑米，施粥救濟，教會會務因以停頓。他爲人性情剛直，思想開豁，素抱大同主義，同情中國，以爲在中國必先輸入科學知識，使民智進展，然後宣傳教義，則事半功倍，其他教士都不能瞭解他，且挾嫌誣以侵吞會款，把他開除會籍。他在山西無法立足，便到北京廣學會充任編輯之職，譯著「列國變通興盛記」「泰西新史攬要」「西國聖賢詳紀」「泰西生計學說考」諸書，持以遍謁當時政治上的權威人物。他曾經遊說於李鴻章、翁同龢之門，李鴻章懷疑他以一個教士，而熱烈關切到中國怎樣維新，怎樣變法，必爲英國派來的奸細，因此不甚親近他；他數度上書，也都不復，直到後來鴻章奉命視察俄皇加冕出國，他亦因事返英，兩人在海船上遇着了，他坐的是三等艙，衣着寒素，行李簡樸，鴻章方纔省悟他並未負有任何政治使命。翁同龢原先很輕視他，而奇怪他以一異域教士，居然能引證孔、孟經典，陳說時事，頗饒興趣，後來翁、李晤門甚烈，同龢傾向變法，意欲使他爲己所用，隔了數年，方纔去回拜他一次。而一般頑固大臣如剛毅、榮祿諸人，則一向認他爲「妖道」。他看見自己的理想既不見用於中國政府，乃於一八八五（光緒乙酉）年創辦「萬國公報」，刊載世界消息，發表自己的主張。他在這時寫了許多文章，大都看重中國如何「轉貧爲富，轉弱爲強」。如「論中國易於富強」，有一段說：

中國軍制，綠營兵餉，除米之外，一月不過一金，即使練勇，月亦三兩五錢至四兩二錢而止。人情儉嗇，不同西國之浮奢，餉項無多，絕異西兵之糜費。中國地大於各國，而練兵不必多於各國，籌餉又復省於各國，但練一兵能獲一兵之益，其額僅與歐西一國埒，則鄰人不得窺伺，疆宇亦得乂安。至於興工作，則價值低廉，設學校，則文字一致，凡此數事均歐西各國所自歎弗如者也。所惜官憲因循於上，學塾玩泄於下，狃於積習，埋沒人材於帖括之中，不能發奮爲雄耳！如果振作有爲，洵有事半功倍者！噫，自海禁既開，時局互異，歐洲諸國，自以開疆闢土爲事，從前既佔美澳兩洲，嗣又分據非洲以爲外府；亞洲之緬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洩（中國）藩服，寸疆尺土，不容輕易以與人者也，而今則安南已鯨吞於法矣，緬甸又蠶食於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併於日本矣。今之時勢豈猶可安常蹈故而不知變計也耶？誠能精以練兵，富以養民，課農商以培根本，

此外開鐵路以通商惠工，立郵政以便民利國，年中運費之所出，所省不知凡幾，郵資之所溢又不知凡幾，由此開各鐵以盡地利，設西塾以育人材，將見物產豐盈，民俗富有，而國勢亦蒸蒸日上，當駕五洲以上之，豈第並駕齊驅已哉！

此外尚有「說富」「說強」「論謀富之法」「續論謀富之法」「論工人宜漸富」「論中國人不知其富」諸篇，其內容雖然祇是一些普通常識，而觀察敏銳，能稱道人所不甚注意的瑣事，立論既以中國切身利害為前提，文字又淺顯明瞭，使有志之士讀了，詫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深深地受到感動。當時鄭觀應曾模倣其體撰「富強說」「西學說」諸文，不外根據他的論斷，加以擴充而已。鄭氏所編「盛世危言」一書，附錄他的作品甚多，風行內地。而康有為梁啟超，都得到他的啓迪，尤屬不可諱言；康有為早就熟讀他的文章，對他欽佩備至。一八九七（光緒丁酉）年，有為挾着自己的著作冒昧去拜訪他，自謂素仰信奉西教，有志改革運動，請他給予幫助。他讀了有為上奏清廷的疏文，至為驚異；彼此引為同志。他那時在京事務繁忙，思欲雇用中文書記，有為即紹介弟子梁啟超前往充任。康梁二氏當時尚不很通西文，他的各種書籍，自然成為他們的知識寶庫。戊戌政變，康、梁得以安全逃亡日本，他也很盡了些力。一八九九（光緒己亥）年山東義和團作亂，倡言扶清滅洋，同時福建、四川也發生虐殺教士事件，他得悉以後，焦慮萬分，曾代表教會上奏民教相安之策，主張詔令官吏與教士往來，則可免除隔閡，但無結果。次年變亂擴大，聯軍攻陷京津，他適因事赴美，欲謀挽救，已不可及。辛丑和約成立，他方重來中國，交涉以山西一省担負的賠款，建立山西大學堂，由他親自充任總教習，翻譯各種新學教科書，造就人材不少。他於一九〇七（光緒乙未）年逝世，他的墳墓就在太原上馬街山西大學堂原址。

李提摩太的摯友林樂知，美國人。為紐約監理會教士，後改隸衛理公會，於一八七一（同治辛未）年派在中國江、浙一帶傳教。他初到中國的時候，嘗從「太平天國狀元」王韜研究中國文學哲學，他的天資甚高，進步極速，有暇復為王韜講述西洋歷史地理，王韜所著「美利堅志」「法蘭西志」「俄羅斯志」「普法戰紀」諸書，都曾經過他的審定。一八七五（光緒乙亥）年，上海機器局改組成立，他就任該局總纂，翻譯歐美書報，對於中國改革事宜

鼓吹不遺餘力。當時機器局出版新書甚多，惟以民智閉塞，銷數並不暢旺，三十餘年，僅能售出一萬一千餘冊，然而却有一個最忠實的讀者——庚有爲。有爲那時，正到上海遊歷，先後購買該局新書凡三千餘冊，幾佔四分之一以上，自己閱讀以後，還遍贈他的門徒，思想因以開拓。至於他自己所著的書，以「五大洲女俗通考」，給予當時影響最大，使中國人讀了，始知婦女纏足，爲中國特有的一種野蠻風俗，有爲更爲之廣事宣揚，於是各地紛紛組織「天足會」「不纏足會」，他且常常奔走蘇滬諸地，公開演說纏足的弊害。一八七七（光緒丁丑）年，他創辦「大同公報」，專載國際新聞，並按期撰著社論闡述世界大勢，欲使中國迎頭趕上時代。如其「克剛論」一文，首敘英、法、俄在歐洲角逐的情形，和日本在亞洲的野心，隨即轉入中國問題，說：

安中國之策何在？曰：惟在塞之者通之而已！今者商務通矣，內地之塞者如故；海道通矣，南北原之塞者如故；財貨通矣，礦產之塞者如故；電線通矣，郵信之塞者如故；語言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之塞者如故。是故我謂其通，人嫌其塞，我圖其塞，人冀其通。通之而不從，必有強迫以通之日，塞之而不得已，必有代決其塞之時。夫持國猶舟也，操舟隨潮汐爲低昂，容與中流，自有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假以桃花水漲，依然繫纜於椿，忽巧風捲濤飛，雲隨海立，橫傾楫摧之險，實過於同舟共濟之人。夫才任濟川者，忍使一國之生靈遽與波臣爲伍哉！或曰：內地盡通商務矣，陸路盡通鐵軌矣，礦產盡通貨貨矣，其若開門揖盜何？郵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驛卒之覆轍何？教化通矣，其若長異端之欲何？情政通矣，其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不知通商者，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通鐵路者，綺交脈注，骨節玲瓏，合全國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見；合他國之人如親戚故舊，休戚可相關；通寶貨者，化腐朽爲神奇，供生人之利用，即如子言，以開門揖盜爲慮，子獨忘「慢藏誨盜」之誠乎？且歐洲各國，又迥非盜賊之比；通郵信者，與鐵路相輔而行，同一聯民心以固國本之長策，且鐵路之作寄害郵，不過通衢大道，異日者郵信以價廉而日多，或更須於常額之外添設驛卒，安有失業之憂！通教化者，取人之長，補我之短，西教以敬天愛民爲本，尊君親上，闡邪存誠，且又格致之學所自出，不可與無父無君之楊、墨同日語也；通情意者，同好共惡，患難相卹；即使

人心不同如其面，斷不致如今日之合而謀我也。凡若此者，皆以通之者塞之之明訓也！誠如是也，中西之好可永，卽歐亞之禍可紓，故爲中國計者，仍不啻爲歐洲計也！

其文瓊瑜互見，越乎法度，如「桃花水漲，依然繫纜於椿」「綺交脈注，骨節玲瓏」云云，皆爲高文典冊所不經見之語，也正是後來時務濫調之所自出，其壞處甚至述理不能透達。而他希望中國進化的熱忱，則昭然紙上。「大同公報」出版甚久，由他經營，十三年未嘗間斷，旋復與李提摩太合作，歸併於「萬國公報」，改由廣學會續辦。他晚年歷任蘇州東吳大學教授校長諸職，對於教育事業，也很有貢獻。他在中國將近五十年，生活習慣都中國化了，他喜穿着中國袍褂，鼻烟一物，爲他不可須臾離的玩物，又極講究飲食，他搜集中國「食譜」一類的書極多，曾爲編目行世。他後來是誤食河豚魚中毒而死的。

和林樂知同在上海傳教甚久，有助於中國變法運動，惟教派不同者，有李佳白。他也是美國人。生於一八五七年。幼時父母雙亡，生活極爲困苦。他二十歲左右，因有立志長途旅行，長老會就派他到中國來傳教。他爲人十分機警，因爲看見當時中國士大夫排斥異教的心理頗切，最初不願以教士的面目出現。他在山東居住甚久，終日和中國人往返，不但能說很流利的中國話，諳熟華北各地方言，且從濟南某氏學習制藝八股，他原想參與科考，取得中國仕途出身的資格，作爲傳教的進身之階；但他煞費了苦心，終爲國籍所限，無法達到目的，然而就此對於中國文學有了很深的造詣。他到過曲阜遊歷好幾次，每次皆以隆重的禮節去瞻拜「先師」，還備了豐厚的禮物去接交「聖裔」，當時衍聖公孔祥珂送了一幅錦聯給他，他常常以此事誇耀於他的友人，認爲生平莫大的榮幸。他奔跑了十餘年，對於傳教毫無成績表現，長老會方面對他頗有煩言，把他召回本國，意欲予以懲罰。他回國後，力言中國傳教不可驟然進行，同時不應狹義地以傳教爲目的，須輔以慈善醫藥事業，始有利於人羣，而易見功效。這時正值中國仇殺教士事件層出不窮，教士來華者多視爲畏途，長老會方纔聽信了他的建議，派他重來中國。他攜帶了鉅款，逕赴北京，創設尚賢堂。每逢禮拜，親自站立街頭，邀約市民入堂受教。他抱着「諸教並行而不悖」的宗旨，主張諸教合參，因此尚賢堂來往的人物，且有道、釋兩教中人。一八九四（光緒甲午）年日本進據朝鮮，交涉決裂，他根

據從使館聽來的消息，便中爲一般市民作詳盡的報道，都中人士始知海外發生嚴重的戰事。他看見中國外侮日亟，當局猶不知振奮，因此一再上書清廷，極陳利害。他說：「夫以貴國之有事兵戎也，僕既不能運籌帷幄，借箸而代畫良謀；復不能枕戈待旦，効命疆場，以爲知己者用。何敢累牘連篇，妄與國家國事，然而，土居是國，既能與人以同樂，而不能共人之憂，則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貴哉！」他是那麼熱忱地希望爲中國服務，他以爲中國要抵禦外侮，約有四端，一曰「養民有要」，就是應講求工藝、商賈，而禁絕鴉片；二曰「教民知本」，就是應講求實學，不徒然「尋章摘句以文辭見長」；三曰「和睦有序」，就是應「上下一體，君臣無間」；四曰「武備亟講」，就是應講求國防，不可「臨渴掘井」，而「各宜變通新法，勵精圖治」（見上中朝政府書，再上中朝政府書）。當時政府懵然不省，而一般思想前進之士如鄭觀應、劉楨麟、黎祖健、管斯駿等，都和他過從往返，研討新學。義和團作亂的時候，北京焚毀教堂，他因爲極得民衆好感，尙賢堂獨能巍然保存，然而他恐怕有意外之變，終於化裝逃出，又將尙賢堂遷往上海。辛丑和約成立，清廷下詔變通新法，雖然表面「嚴祛新舊之名」，實際上，一般守舊大臣，仍視新政新學爲「洪水猛獸」。他在這時創辦一種刊物，名曰「尙賢堂紀事」，發表很多文章，大聲疾呼，闡述維新的利益。如其「中國能化舊爲新乃能以新存舊」一篇，首敘中國地幅、氣候、人口、文教皆具備了「第一等國家」條件，然「自通商以來，辦理交涉近六十年，均害之利益他國所能得者，中國轉不能得；應全之體面他國所顧惜者，中國轉若不甚顧惜」，他覺得完全是不能「變通新法」的原故！他說：

佳白久居中國，漸諳華故，領習華情，設身處地，以心度心，何敢謂西法之盡臻美善；第以俄羅斯取則於前，而日益強大，日本取則於後，而頓啓封疆，（原註：日本之改舊從新太盡太驟，仍有流弊，日人自知之；西人亦多識之。中國於此，正宜抉擇，但法日人之勇於自強而去其短斯可矣！）獨中國深閉固拒，以爲非宜，然而數十年來之數亦略可睹矣。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治天下之法，亦猶器也！冠既敝不足以加於首，履既敝不足以適於足，衣既敝不足以章於身，屋既敝不足以障日蔽雨，車既敝不足以引重致遠，舟既敝不足以破浪乘風，法既敝不足以保邦土而威四遠。今不問器之適用與否，而但執其歸所傳習者而寶之，

大異乎周任之明訓矣！

他又分析中國所以不願變通新法只有兩種心理：一是以爲「新法宜於西不必宜於中，而存一無足輕重之見」；一是以爲「仿行之新法累試無效，因難見阻而隱有厭薄退怯之心」，結果故步自封，國勢日弱，而一一皆委之於氣運。他覺得這是中國前途最可怕的礁石，他沉痛地說：

中國之於新法，誠可謂困而學之者矣！猶且學其粗不學其精，學其偏不學其全，學其末不學其本，以數千百人學之，未嘗令通國百姓合力圖之也；以幼年子弟學之，未嘗集學士大夫肄業及之也；以尋常技能例視之，未嘗以巍科顯仕鼓舞之也。浮薄淺嘗，廢於半途，猝有事變，應用不靈，遂以爲泰西新法，不過如是，無益人國。即有以改弦更張之說進者，將叱而出之，意興索然，景象頹然，識解膠然，而徒歸咎於氣運之適然，前事之不然！嗚呼，歸咎於前事之不然，論似差近；如歸咎於氣運之適然，則佳白殊未敢以爲是也！

都能針對中國弱點，痛下鍼砭，而他的文章條理縝密，引用故實，恰稱其旨，與林樂知相較實高一籌。他始終眷戀着中國，民國建立以後，他仍居住在上海，致力慈善事業。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美國最後參戰，他站在宗教的立場，通電反對，頗爲美國政府所不滿。直到一九二一年方纔逝世。

周桂笙

大家談到我國最早介紹西洋文學的人，都認定是林紆，殊不知周桂笙比林紆更早，可是現在已不復爲人所記憶了。

周桂笙的翻譯工作在質量方面雖趕不上林紆，但有三事使我們不能忘懷於他：第一他是我國最早能虛心接受西洋文學的特長的，他不像林紆一樣，要說迭更司的小說好，必說其有似我國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認歐美文藝本身的優點的。第二，他翻譯的小說雖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淺近的文言和白話爲工具，中國最早用白話介紹西洋文

字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三，他的翻譯工作，在當日實抱有一種輸入新文化的企圖，雖然沒有什麼成績表現，他的一番志願是值得表彰的。當然，他有許多不可諱言的缺點：他翻譯的東西每不註明來處，或甚至不註明作者的名字，即有標明着作者的，亦為譯音，今已不可攷知。還有他歡喜任意增刪原文，譬如他的「新庵諧譯」，短短的篇幅中亦隨時可發現增刪的痕跡。最糟的是他對小說的認識並不全備，常鬧笑話，如他翻譯的那篇「自由結婚」，（載月月小說，後收入「新庵九種」）標明為小說，實際不過是報紙上一段社會新聞；這正和林紆將小學教科書裏的故事當作小說一樣的不可原恕。他的鑑別能力之薄弱，與其他初期翻譯界的人不相上下，這也許是迎合讀者興趣的原故。可是輸入所謂「偵探小說」到中國來的，他却是最力的一人。「偵探小說」的名詞由他而成立，許多人都跟着浪費精力和時間，去創作或翻譯這種無聊的東西，一直到民國六七年間，鴛鴦蝴蝶派的文士們還在大寫其武俠小說，也就是中國式的偵探小說，不能不說是受了他的影響。

周桂笙，字樹奎，一字辛靈，又作新庵。上海人。曾肄業上海中法學堂，治英法文。最初在梁啟超所編的「新小說」雜誌投稿，後來汪慶祺創刊月月小說，聘吳沃堯（即我佛山人）任撰述編輯，聘他任譯述編輯，遂得專心從事小說的翻譯。自謂「所讀中國小說合筆記、演義、傳奇、彈詞凡二百餘種，當時新譯新著小說亦百餘種，英法兩國小說各三百餘種，美國小說亦不下一百種，其餘短篇之散見雜誌日報中的亦數百種，總計約千餘種。」（見新小說所載新庵小說小話。）他與沃堯交誼最厚，是當時海上文壇的兩大重鎮。沃堯每有一新計劃，或成一新作品必先就正於他。沃堯曾說：「余旅滬廿年，一無所成，惟得識周某，亦不虛此行矣。」（見吳新庵諧譯序）他中年曾一任天津電報局局長，並獨資經營航業。鼎革前與民黨諸人往還甚密。民國元年，為李蔚棠編輯上海天鐸報，這是同盟會的一個言論機關。他的私生活很儉樸，只是好飲酒。曾兩遊日本。以民國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翻譯就我所看到的，計有：童話「新庵諧譯」一種，隨筆「新庵譯萃」一種，小說「毒蛇圈」、（法鮑福著）「八寶匣」、「失舟得舟」、「左右敵」、「飛訪木星」、「海底沉珠」、「紅悲案」、（法紀善著）「含冤花」（莫培台爾著）「妒婦謀夫案」、「福爾摩斯再生案」（英高陶能著）各一種，另有「新庵五種」，「新庵九